

從同光體詩學觀論夏敬觀說孟郊詩*

吳淑鈿**

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

摘 要

夏敬觀是近代同光體後期詩人，於唐詩研究中，特重孟郊。本文由同光體重詩品與人品關係的詩學觀為基礎探討夏氏體認孟郊詩的深度；先討論夏氏對孟郊生平隱嵩時期的觀點，再綜論他對孟郊詩的窮、奇、深重新作出評價，及為郊詩於中唐詩史中定位。論文又用比較研究法，通過與同期論者華忱之和聞一多的觀點作比較，考察夏氏對孟郊詩的體認角度，和他的孟郊詩研究於近代詩史上的意義。

關鍵詞：同光體，中年隱嵩，真摯性行，言淺意深

夏敬觀（1875-1953）是近代同光體後期詩人，於古典詩詞俱深研有得。在各本論詩專著和詩歌選注中，從八代詩到唐宋詩他都作了系統的研究。^{（註1）}夏氏於唐詩研究中，特重孟郊（751-814）。《唐詩評》中評點唐詩人李杜等諸家八篇，孟郊佔其中一篇。而七本詩歌選注中，除《漢短篇鐃歌》外，宋金詩人五本，唐詩人只孟郊一本。夏氏選注的《孟郊詩》為學生國學叢書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40年出版。全書選錄共五十三題八十一首詩，書前有〈導言〉及〈年譜〉各一篇。孟郊生前身後都沒有人為他編輯文集，宋初雖有孟集刻本，但相當雜亂，其後宋敏求整理編輯，總為十卷，共有詩五百餘首。按主題及體製別為樂府、感興、詠

* 本論文考辨孟郊中年隱嵩的部分，蒙葛曉音教授提示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 本文作者電子郵件信箱：stng@hkbu.edu.hk。

1. 夏氏論詩專著有《八代詩評》、《唐詩評》、《唐詩概說》、《劉融齋詩概詮說》，選注詩集有《漢短篇鐃歌》、《孟郊詩》、《梅堯臣詩》、《王安石詩》、《陳與義詩》、《楊萬里詩》和《元好問詩》等。

懷、遊適、居處、行役、紀贈、懷寄、酬答、送別、詠物、雜題、哀傷及聯句等十四種。夏氏所選，包括了上述分類的十一種，不及行役、酬答和聯句三種。本文根據此選注本與《唐詩評》中的〈說孟郊〉一篇，^(註2)由同光體詩學觀的角度，探夏氏體認孟郊詩的深度。同光體是清代宋詩派的末流，以肌理派、浙派及桐城詩派的詩說為詩論淵源，直承道咸宋詩派理論家何紹基的論詩精神，主要詩論家以陳衍為代表，其論著《石遺室詩話》被視為清代宋詩運動的理論總結之作。同光體詩人論詩重視創作主體的學問根柢與德性修養，文學上的終極關懷貫徹近代重視「詩與人一」、「人與文一」、「詩品出於人品」的論詩品格，^(註3)主張修身乃成文之道，如何紹基云：「道充於身，德涵於心，心與造物游而理於事類精，乃演之於文，乃聲之於詩，萬情畢入，萬象俱出。」^(註4)詩品與人品的關係雖是傳統詩學的老話題，清末詩論家對此特別強調，則是出於一種時代危難中對民族道德與傳統文化本位的痛切反思要求。故夏敬觀論孟郊詩，由「人」出發，非常重視詩人的真摯性行。夏氏的孟郊年譜提出「中年隱嵩」的問題，除了是他對詩人生平作細緻考察的獨出之見外，也與他欲建立自己道德理想中的詩人形象有關係；夏氏為歷代就孟郊負面性格為評的觀點作深拓。又同光體詩人由於處身唐宋詩之爭的調和階段，雖屬宋詩派，往往能從宏觀的角度看待宋詩對唐詩的承傳，將唐宋作為一個詩學系統而非兩種類型，建立積極的詩史觀。^(註5)陳衍反對強分唐宋，舉出宋詩乃本唐詩而作出變化的諸例中，也包括了孟郊。^(註6)夏氏論郊詩於中唐詩史中獨開一派，便是同光體詩史觀的體現。同光詩人由宋規唐，尊崇杜韓，韓愈是詩派的詩學典範之一。但他們更重宋人活法，以自主自立的精神學古。面對前所未有的豐盛古典詩歌遺產，他們意識到獨創的重要性。故夏氏論郊詩，刻意強調他的「獨造」，先把自韓詩的強大影子中分別開來，再為他製造時代感，標示其特殊性。夏氏於論孟郊詩中實寄託了自己的文化理想。

歷代論說孟郊詩的資料非常豐富，近年深入整理相關課題的研究如李建崑

2. 夏敬觀，《唐詩說》（台北：河洛出版社，1975年），頁81-84。
3. 「詩與人一」見龔自珍，〈書湯海秋詩集後〉，《龔自珍全集》（香港：中華書局，1974年），頁241。「人與文一」見何紹基，〈使黔草自序〉，《何紹基詩文集》（長沙：岳麓書社，1992年），頁781。「詩品出於人品」見劉熙載，〈藝概〉，《劉熙載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114。
4. 何紹基，〈湯海秋詩集序〉，《何紹基詩文集》，頁767。
5. 吳淑鈿，《近代宋詩派詩論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頁148。
6. 陳衍，《石遺室詩話》卷一（台北：商務印書館，1976年），頁3。

〈孟郊詩歷代評論資料述論〉，對唐至清各代的孟郊詩評作考察、評估與歸納主題，所論甚詳，惟未涉同光體論孟郊詩資料。^(註7)〈述論〉其文指出，直至清代，論者雖然肯定了郊詩在樂府與五古上的成就，但對其寒苦奇險之主調仍未全盤接受。^(註8)縱觀今天的郊詩現代研究，「郊寒」「苦吟」等仍是最大的主題，論者廣泛挖掘到詩人的思想倫理、審美心理、語言藝術表現以至所屬詩人群體等各層次，作多面體的考察。在「歷代」與「現代」的孟郊詩研究之間，我們再細看上世紀四十年代夏敬觀對孟郊詩的體認，會發現他的論與注都深具詩學與文化的價值。夏氏由詩人生平切入，本同光體詩學觀看孟郊詩的藝術世界，一方面對歷代主流詩評的「寒苦」作翻案，一方面指示後世欣賞郊詩「奇險」的角度，其中雖帶著一定的主觀色彩成分，但參考與他同期的郊詩研究成果，夏氏的論說有著非常重要的補充作用。本文以下先討論夏氏對孟郊生平隱嵩時期的觀點，再綜論他深賞孟郊的真摯性行，對其詩的窮、奇、深重新作出評價，為郊詩於中唐詩史中定位。至於與華忱之和聞一多（1899-1946）的觀點作比較，是為更深入考察夏氏對孟郊詩的體認角度，及他的孟郊詩研究於近代詩史上的意義。

一、夏敬觀的孟郊生平研究

清末同光體詩人論詩，首重詩與人的關係，主張詩品出於人品，故夏氏每注詩，皆列詩人年譜於集前，用意有由作者觀照作品的作用。他在《孟郊詩》〈導言〉中說：「讀孟郊的詩，先要知道他的性行，和他生平所歷的時代境遇，才覺著他的詩真切有味，在文學上是佔有重大價值的。」^(註9)夏氏對孟郊性行的論述，於下節討論。關於「生平所歷的時代境遇」問題，夏氏提出獨特的觀點，推翻宋代以來「少隱嵩山」之說，認為詩人是「中年隱嵩」。本文經詳細考辨，發現夏氏此說實有可採之處。

接近代對孟郊生平之研究，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有李士翹和華忱之的兩種年

7. 李建崑，〈孟郊詩歷代評論資料述論〉，《文史學報》，1997，27期，頁13-35。

8. 全上註，頁21。

9. 《孟郊詩》，頁1-11。

譜。(註 10)夏氏的孟郊年譜明顯未有受到研究者注目。(註 11)但夏氏的年譜既與華氏的年譜同刊於 1940 年，兩者理當不存參照關係。比較之下，亦可見編譜用心彼此不同。夏氏編譜，為建立與讀孟郊詩的關係，在以人繫詩；讓讀者知道他生平大概，了解詩人的道德人格，然後由此去「覺著他的詩真切有味」，以補史傳不足，故寫得簡略。華氏編譜，則主在知人論世，以詩繫事；試圖重建詩人一生經歷與創作的面貌，列史事與同期詩人活動資料之背景考述，故記敘力求詳盡。夏氏孟譜除於天寶十載東野出生一條之下，就詩人故居、親族、交遊及隱嵩時期等問題引詩論證外，三十歲以下各條，就只抓住與此相關的幾個片段為脈絡，勾勒詩人身世輪廓。

孟郊的生平，研究者主要說他賦性耿介，事母至孝，屢試下第，四十五歲左右始考得進士，然一生始終不遇。詩人三十歲前的資料甚少，早期行迹無法確考，惟新舊唐書都稱他「少隱嵩山」，元辛文房《唐才子傳》亦稱其「初隱嵩少，稱處士」。(註 12)夏氏與華氏的孟譜最大的不同，便是在孟郊的隱嵩問題上。華氏在 1984 年出版的《詩集》及 1995 年出版的《校注》所附孟譜中皆指出，由於文獻不足，東野居嵩的經過和時間，以及這段時期的創作，已難確考。他於建中元年三十歲「東野往河陽」一條下說明：「但他是否由隱居的嵩山來此，未敢臆斷。」(註 13)夏氏孟譜在這方面則就新舊唐書說法而有改定，認為孟郊曾隱嵩山，但不是少隱，而是中年時期。〈導言〉說詩人「久居嵩洛」，又說〈弔元魯山詩〉是他「中年居嵩」，想慕元的為人而寫。〈年譜〉中一再指出：「先生居嵩，已非少年。」「居嵩當在屢試不第之後。」「蓋久不第，始隱於嵩，不復應舉，惟簡往也。」「先生既居嵩，義興莊居則為二弟所處。在溧陽解官時，其弟迎母回義興。其後先生居北，則仍迎母奉養。」「不知先生居嵩後，固久不赴舉。」「知居嵩以後，未嘗屢屢赴

10. 李士翹《唐孟郊年譜》發表於 1934.5.16,22,23 之《北平晨報·藝圃》，及 1936 年《漢鋒月刊》18,19 期。華忱之《唐孟郊年譜》有北京大學圖書館 1940 年排印本。載杜曉勤，《20 世紀中國文學研究：隋唐五代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年），頁 564。
11. 除李、華兩種年譜外，杜曉勤指出此後 20 世紀孟郊之生平研究，只有華忱之再版其年譜，及 1985 年 3 期張金亮於《鹽城師專學報》發表〈孟郊去溧陽尉並非辭官考〉，此外：「未見有人對孟郊的生平作新的研究。」見頁 564，全上註。
12. 傅璇琮《唐才子傳校箋》云：「孟郊究於何時隱嵩山，已不可考。」（北京：中華書局，1989 年），頁 504。
13. 1941 年華氏的《唐孟郊年譜》鉛印本未載此語，見《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 年），頁 384。《孟東野詩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年），頁 205。《孟郊詩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 年），頁 527。

試，其屢試不第，乃少年時事耳。」^(註14)強調詩人早年屢試不第，之後隱居嵩山，久不赴試，只從叔孟簡曾赴試。

華氏孟譜在未肯定詩人是否少隱嵩山後，年譜中便不及隱嵩之事。其述孟郊貞元八年下第後，訪張建封於徐州，到過蘇州小住。貞元九年再下第，自長安遊朔方，再遠遊湖楚，途經巴山巫峽，又經京山、雲夢，訪盧虔於復州。十一年自汝州往長安三度應試，次年才登第。夏氏孟譜於貞元十一年亦載登第事。但他並沒有列出詩人屢試不第的少年時期所繫。貞元四年條下謂韓愈勸詩人往徐州見張建封，所寫〈孟生詩〉之意在「毋以未得第，遂終於隱。」而孟郊〈答韓愈李觀別因獻張徐州詩〉並非下第詩；「果為試後下第者，則他題如〈落第〉〈再下第〉〈下第東歸〉〈失意歸吳〉〈下第東南行〉，皆直書之。」則以「久不第，始隱於嵩」之說觀之，夏氏所指詩人的中年隱嵩時期，其意為貞元四年至十一年之間的事了。但年譜中仍沒有明言。至於詩人貞元十一年應試登第後的行跡，兩譜的差異有二。一是夏氏將詩人「似往楚或行謁復州盧虔」繫於貞元十二年，此外是貞元十六年詩人選為溧陽尉前，華氏說他在常州，而夏氏則由〈邀花伴〉詩序證他「曾往朔方」。

本文認為夏氏「中年隱嵩」之說其實可成立，只因未作詳細論證，故不易了解。首先，他認為詩人隱嵩「已非少年」。天寶十載條下云：「按史稱先生少隱嵩山，今以集中〈湖州取解述情〉〈失意歸吳因寄東臺劉復侍御〉諸題證之，則居嵩當在屢試不第之後。」他是以此二詩反證孟郊非少隱嵩山。蓋由湖州拔解，即少時在吳。失意歸吳，也是居吳，見孟郊少時在吳而非在嵩。次首前四句云：「自念西上身，忽隨東歸風。長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由「又落」可證為再次落第，則孟郊至少兩次落第都是來自吳和歸於吳，沒有少隱嵩山這回事。現代的孟郊研究中便有指孟郊詩作中以嵩山為題的，風格不類其少作。^(註15)

其次，詩人在屢試不第之後，至貞元十二年擢第之前，是否隱居？夏氏用〈山中送從叔簡〉及〈山中送從叔簡赴舉〉二詩以證「蓋久不第，始隱於嵩，不復應舉，惟簡往也。」(《年譜》)觀次首末句：「卻笑薛蘿子，不同鳴躍年。」「薛蘿

14. 〈年譜〉，載《孟郊詩》，頁1-17。

15. 見賈晉華〈華忱之《孟郊年譜》訂補〉。其文說「孟郊未隱嵩山」，值得商榷。《唐代文學研究》(四) (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3年)，頁217。

子」是隱士。夏氏之說其實有理。孟簡何時擢進士第，史書未有確載，若以華氏所考的「大約當在貞元七年」，^(註 16)則貞元七年前詩人已隱山中。再由〈擢第後東歸書懷獻坐主呂侍郎〉一首看，也見他擢第前是處於隱居狀態的。其詩有句：「幽意獨沈時，震雷忽相及。」「慈親誠志就，賤子歸情急。」「松蘿雖可居，青紫終當拾。」貞元十二年呂渭知貢舉，孟郊說登第前過的是獨自幽居的生活，母親勸他赴試，「松蘿」雖值得嚮往，功名仍是當下選拾的目標。這說明他的確曾隱居。

然則詩人是否隱於嵩山？及何時隱嵩？孟郊最著名的〈秋懷十五首〉整組詩都哀嘆自己老病貧苦之狀，論者多以為屬晚年之作，如華氏說是五十九至六十三歲之間：「老病侵尋，貧苦無告，因賦詩抒感。」^(註 17)然觀〈其一〉云：「去壯暫如剪，來衰紛似織。」〈其五〉云：「瘦攢如此枯，壯落隨西曛。」〈其十二〉云：「抽壯無一線，剪懷盈千刀。」古人三十稱壯，《禮記·曲禮上》：「三十曰壯，有室。」可見這組詩作於他正從壯年進入衰年的階段。〈其一〉末句云：「詎忍逐南帆，江山踐往昔。」可見詩人此時不在江南。〈其十〉又云：「南逸浩淼際，北貧礪确中。曩懷沈遙江，衰思結秋嵩。鋤食難滿腹，葉衣多醜躬。」其言詩人是在位於北方的貧瘠土地上耕種為生，衰思與秋天的嵩山相結，而南方已成為遙遠的回憶，可知此時在嵩山「鋤食」。元和二年，孟郊五十七歲時，官於洛陽，五十九歲後服喪家居，雖家境清貧，但不至於在「礪确」中「鋤食」。又詩人五十八歲在洛陽喪子，韓愈〈孟東野失子〉詩序謂：「東野連產三子，不數日輒失之，幾老，念無後以悲。」^(註 18)〈秋懷十五首〉無一處提及「無後」之悲。此外，孟郊六十歲時，韓愈授河南縣令，與盧仝等常和孟郊相過從，與詩中「孤隔文章友，親密蒿萊翁」(〈其十〉)之境況亦不似。因此〈秋懷〉組詩當作於中年而非晚年；詩人在壯年之後，曾住在嵩山一帶。另外可作旁證的尚有〈下第東歸留別長安知己〉一詩，其中「雲歸嵩之陽，身寄江之濱。棄置復何道，楚情吟白蘋。」四句既說明詩人曾隱於嵩山，又可證他在其中一次下第前已在嵩南隱居，而嵩山非故鄉，故借「浮雲遊子」之意曰「雲歸」。詩人將歸嵩之陽，而暫去寄住江之濱，由末句「楚情」觀之，江濱當指洞庭一帶而非其湖州舊居。此詩與〈汝州南潭陪陸中丞公宴〉

16. 《孟郊詩集校注》孟郊年譜，頁 538。

17. 《孟郊詩集校注》，頁 164。

18. 《韓愈全集校注》(元和三年)(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6年)，頁 457。

詩可互參，其曰「遠客洞庭至，因茲滌煩襟……山態變初霽，水聲流新音……誰言柳太守，空有白蘋吟。」二詩結尾相呼應，但心情表現很大變化，顯然是因在汝州見到陸長源的緣故，以致否定了之前的吟白蘋。則兩詩合看，此詩顯然是自洞庭來汝州時作，陸長源於貞元十二年離汝州轉任汴州刺史，故可知此詩必作於貞元十二年之前，是以詩人來汝州前已在嵩陽居住。再看〈石淙十首〉〈其十〉末句謂「去矣朔之隅，憊然楚之甸。」亦可證詩人赴洞庭之前是在嵩山。石淙在河南登封縣東南三十五里，為嵩山名勝。^(註 19)詩中所說「聖朝搜岩谷，此地多遺玩。」乃指高宗武則天時多在嵩山搜羅隱士之舉。注家以此詩多用朔風朔水語，認為是詩人出遊朔方之作，值得商榷。「朔」乃指北方而已。

孟郊在貞元元年曾得到陸長源的照顧。貞元元年陸任檢校郎中，兼御史中丞，充轉運副使。孟郊〈贈轉運陸中丞〉末句云：「不是宗匠心，誰憐久栖逢。」夏氏在貞元十一年詩人登第條下說：「是年陸長源尚在汝州。先生有〈汝州南潭陪陸中丞公宴〉〈汝州陸中丞席喜張從事至同賦十韻〉〈夜集汝州郡齋聽陸僧辯彈琴〉〈鷗路溪行呈陸中丞〉四詩，皆是年以前所作也。」按《唐刺史考》，陸於貞元五年至十二年刺汝州。^(註 20)汝州近嵩山。《元和郡縣志》卷七：「汝州，西北至東都一百七十里。」而登封縣「西北至府（洛陽）一百三十五里。」^(註 21)則嵩山與汝州相距不過三十多里。高宗則天時，臨幸汝州溫湯，必去嵩山，如《舊唐書·本紀第五》高宗調露二年二月：「癸丑，幸汝州溫湯。丁巳，至少室山…己未，幸嵩陽觀及啓母廟…甲子，自溫湯還東都」。〈本紀第六〉則天萬歲登封三年臘月：「戊寅，幸汝州之溫湯。甲戌，至自溫湯。造三陽宮於嵩山。」^(註 22)由上述汝州四詩看，先是詩人曾有一次下第東歸，改道復州干謁盧虔，〈自商行謁復州盧使君虔〉有句：「未遂東吳歸，暫出西京塵。仲宣荊州客，今余竟陵賓……驅馳竟何事，章句依深仁。」但沒有結果，^(註 23)於是再往汝州依陸。〈鷗路溪行呈陸中丞〉說：「出阻望汝郡，大賢多招携。疲鳥戀舊林，羈禽思故棲。應憐泣楚玉，棄置為塵泥。」

19. 《河南通志》卷七，見《文淵閣四庫全書》。

20. 郁賢皓，《唐刺史考全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0年），頁720。

21. 《元和郡縣志》卷七及卷六，見《文淵閣四庫全書》。

22. 《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06及頁128。

23. 《唐刺史考·復州》載盧虔刺復州時間是「約貞元11年」，實則未詳。夏氏說孟郊交遊，以盧虔為最早，是次往復州之外，未居嵩前，家居湖州時，尚有一次隨盧入湘。

這首當作於〈汝州南潭陪陸中丞公宴〉之前，詩人知道陸在汝州，希望得到故交的提携。同賦與聽琴兩首亦同時之作。綜合上述，以陸刺汝州的時間看，可知詩人在貞元十一年之前，曾隱居嵩陽，其中一次往長安赴試再落第後，沒有歸吳，本擬東歸嵩山，歸嵩後改道湖楚謁見盧虔，未能久留，旋轉汝州依陸長源。事實上詩人在汝州附近的嵩山居住，也正好受到陸的照應。〈新卜青羅幽居奉獻陸大夫〉一首更可見他即使在登第後仍依靠陸長源，甚至跟隨陸到汴州卜居：「黔婁位何處，仁邑無餒寒。豈誤舊羈旅，變為新閑安。二頃有餘食，三農行可觀。」蓋此時已衣食無憂，和〈秋懷〉中境況大不相同，而且明言他曾兩度依靠陸。按孟郊依陸在貞元十二年擢第前，赴洞庭必在是年之前，盧虔刺復州約在貞元十一年，依三年一任計，盧貞元九年很可能已在復州。又按華氏孟譜考孟郊貞元九年落第有雁塔題名殘拓本之確證，^(註 24)判斷孟郊是年自長安出遊楚湘亦可信。如此推算孟郊至遲於貞元九年落第前已隱於嵩陽；故夏氏所說的中年隱嵩之說是可以成立的。但夏氏指詩人隱嵩後不復應舉則未必盡然。

夏氏孟譜所引中年隱嵩之詩證，尚有〈初於洛中選〉一首。前半首云：「塵土日易沒，驅馳力無餘。青雲不我與，白首方選書。宦途事非遠，拙者取自疎。終然戀皇邑，誓以結吾廬。」華氏繫此首於貞元十六年，以「選」為「選授官職」，即於洛中銓選為溧陽縣尉。夏氏則認為「選」下疑脫「書」字。天寶十載條下云：「唐時書皆傳寫，故讀者有選書之要。先生詩意，謂頻年行役已倦，今已老矣，既不獲登第，乃退而選書……誓結吾廬，則卜居之謂也。據此，則先生居嵩，已非少年。」觀「白首方選書」句，詩題脫字之說實有理。詩意所見，顯然是中舉之前所作。當是詩人在落第後，透露欲在洛陽附近卜居之意；結吾廬句，當即居嵩之始。又唐代東選始於貞觀元年，但次數不多。按《唐會要》卷七十五載三次東都選，是在開元元年、元和二年及太和二年，太和三年東都選已停。^(註 25)王勣成《唐代銓選與文學》指出「東選是臨時性的權宜之制」，「有唐一代，在東都洛陽置選次數並不多」，但他用歐陽詹和孟郊到洛陽參加銓選為證，說貞元年間也曾舉行

24. 《孟郊詩集校注》，頁 546。

25. 《唐會要》卷 75，《文淵閣四庫全書》。

東選。(註 26)考之史傳及二人詩作，卻俱無二人選於洛陽的明證，故貞元年間東都是否有正常銓選，實仍有疑問。

論者說孟郊詩繫年之難，甚於牧齋嘆注杜詩之難。(註 27)孟郊「少隱嵩山」既缺稽實之資料，夏氏所說的中年居嵩，雖未作詳細論證，但由郊詩觀之，實有可信之資。近代以來的孟郊生平研究，華氏孟譜雖然仍有不少含糊之處，其影響較大，諸家論注多承其言。目前所見關於孟郊的隱嵩問題，一般仍沿史書之說，或採存疑立場。(註 28)夏氏之說明顯未受重視，故有重新「發掘」並予以肯定的必要。夏氏特別強調孟郊中年隱嵩之行迹，除了是他細讀郊詩的獨出之見外，他其實也意圖藉此構建自己道德理想中的詩人形象，由此表現其真摯性行。他在〈導言〉中論詩人「賦性褊隘」，(註 29)乃因執道始終：「他的性情，同他生平的行誼，豈是能徇人而變的，自然是抱道而終的了。」他說的道是「一不改方圓，破質為琢磨」(〈上張徐州〉)的正道直行之操守。大概「屢試不第，隱於嵩山，未嘗赴試」的藝術形象，才合詩人「行吟谿曲，泊無宦情，奪俸十年不慍，一寒到死」之性行表現。(註 30)以下再就詩人性行部分作論述。

二、孟郊詩表現詩人的真摯性行

夏氏側重的孟郊詩價值，首在能表現詩人的真摯性行。他為郊詩的「窮」翻案。

歷代評孟郊詩，雖有同代韓愈與李翱等之推許，但自張為《詩人主客圖》名

26. 王勛成，《唐代銓選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198。又書中以孟郊為例說明唐代銓選年限，第二章「及第舉子守選」說孟郊於貞元12年及第，守選三年，貞元15年到洛陽參加冬集，指出「是年銓選分東西選，東選在洛陽舉行」，並以〈洛陽晚望〉與〈初於洛中選〉為詩證。然觀〈洛陽晚望〉末句「月明直見嵩山雪」，中懷隱志，不見選官的心情。頁55。
27. 司金鑾，《〈孟郊詩繫年補考〉題記》，《淮北煤師院學報》，1994，2期，頁95。
28. 如邱燮友、李建崑的〈孟郊事蹟編年簡譜〉指出乃參照華氏及夏氏的年譜，但沒有提及隱嵩的事。見《孟郊詩集校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頁589。尤信雄的〈孟郊年譜〉沒有提隱嵩之事，但在論生平事略時則曰：「少時曾隱居嵩山，讀書洛中。」見《孟郊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4年)，頁15。韓泉欣《孟郊集校注》的〈孟郊簡譜〉詩人三十歲一條下則依華氏之說云：「按新舊唐書本傳稱孟郊少隱於嵩山，但由於文獻不足的關係，關於他在河南嵩山隱居的經過和時間，以及他在這段時間中究竟寫出了哪些詩篇，現已很難確定。」(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頁508。
29. 原為宋吳處厚論孟郊詩語，見《青箱雜記》(卷七)，載《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604。
30. 國材〈孟東野詩集序〉，載《文淵閣四庫全書》《康熙御定全唐詩錄》卷五十。

曰「清奇僻苦主」以來，所評多不脫「窮」、「苦」、「寒」等字眼，如歐陽修《六一詩話》說他「以詩窮至死」。及東坡〈祭柳子玉文〉中「郊寒島瘦」語出，以下論者大抵不出寒苦憔悴的調子，故又有《滄浪詩話·詩體》之「憔悴枯槁」、「局促不伸」，和元遺山《論詩三十首》（十八）之「窮愁死不休」、「詩囚」等語。要之論者所體認的，主要在孟郊之負面性格表現一面。夏氏由此傳統郊詩視野出發，由「窮」深究到創作的根柢中去，找出詩人性格特點背後的歷史文化積澱，從而折射出其評論的獨特角度。

夏氏於〈導言〉中指出：

淺嘗孟郊詩的人，莫不說是窮而益工，或說是詩能窮人。要知道孟郊的窮，決不是詩做窮的，他的詩工，也不靠一個窮字造就。他的窮，是他性行造就成的。他的詩，也是他性行造就成的。

他不同意孟郊詩是窮而後工，認為孟郊詩的窮是詩人性行表現。詩人性行可見之於詩，〈說孟郊〉云：「大凡文藝必出於真摯者，方能使人讀之親切有味；真摯之文藝，根於作者之性行，故作者性行何似，可於文藝中見之。」只有披文以入情，才可了解這位「新舊唐書皆難於表現」（〈導言〉）的詩人的真摯性行。作為同光體詩人，夏氏十分重視詩與人的關係，但他並不片面遵行知人論世的傳統解讀方法，而能以現代的研究觀念辯證看待問題；既由詩知人，亦由人知詩。以讀者為主體，切入文藝欣賞活動的思考。在精選的孟郊詩中，夏氏最刻意表現的，實乃詩人「萬俗皆走圓，一身獨學方」，（〈上達奚舍人〉）孤高不群、堅執己道的藝術形象。詩人的品格令他不願俯仰隨人，最終只能做個難於事親的縣尉，故「窮」。夏氏說孟郊的窮，在於他的褊隘；他的褊隘，在於他抱守的道。詩注中也特別標出這一點。〈戲贈無本二首〉（其二）「將明文在身，亦爾道所存」句注曰：「以文章之妙，補綴為衣，遊於王公之門，笑傲自若，將以明其文之在身，亦即道之所存也。」（註31）詩人的道，存於身上之「文」，正是這種知識分子的自覺，使他自嘆自負，也因此而仍存大志得伸的想望。〈生生亭〉一首末四句云：「浩言無媿同，媿同忍醜醒。致之未有力，力在君子聽。」詩人宣示心迹，直言失意是因為未能受到賞識，但

31. 《孟郊詩》頁23。

無奈之餘，亦絕不苟且周容。夏氏注曰：「言欲求世悅，其言莫如從同，若以苟同為媿，則須忍為眾所謂醜，眾醉而我獨醒也。且吾意雖高，欲致身以事君，未有其力，力在君子之聽納也。」^(註 32)指出詩人無法勉強自己是失意因由。他另於〈泗州楊杏城侍郎詩序〉一篇提到詩人雖獨醒而無能為力的外因：「予生平喜唐孟東野宋梅聖俞之詩……義山官止使下員外，與東野之終於興元參謀，聖俞之終於都官員外郎，數奇正相類……然則詩人之窮達利鈍，固非其詩有以致之也……然則詩人之窮達利鈍，又政理之盛衰有以操之。豈其人之詩溫而裕者，遂足以回天之命而利達其身也哉。」^(註 33)是說孟郊的「數奇」與「窮」，也與政理盛衰密切相關。

然而夏氏說孟郊之窮，終不在於論其性行的褊隘，或揭政理之盛衰。他著意於詩人一生所偏執的道德理想。這背後深藏著同光體詩人一種特殊的時代文化心理在內。重新回到夏氏選注唐詩的問題上去；為什麼唐詩人中夏氏只選注孟郊的詩？中唐詩人孟郊的作品顯示了怎樣的一種歷史與文化的象徵意義？我們相信可以由中國古代士人的文化傳統試作考察。自先秦至中唐，士人階層即知識分子的集體際遇與歷史大流緊相密合。余英時在《士與中國文化》中對此課題作了深入研究。他指出自春秋知識傳入民間，戰國時期的士人已具高度自覺精神，遊士曾是當時社會的重要力量。至漢代，士大夫聚成強大的宗族，具深厚經濟基礎，建立高門。士人深受儒學薰陶，晉身利祿，左右政治。漢末至魏晉則由於禮樂崩壞，士人感於名教自然之辨，嘆人生倏忽，精神意態表現為個體之高度自覺，將名位不顯的憂患寄託在老莊養生的人生理想中。兩晉是社會階層分裂已甚的時代，門第懸殊中世族有優越的文化條件，名門大家有家學，掌握著知識以至文學批評的準則，直到劉宋以寒門庶人得政以後，寒士才再有上升的機會。^(註 34)在唐代，雖然初唐門第風氣仍盛於一時，但科舉考試制度也提供了下層士人追求人生理想的開放機會，加上唐代國勢奔騰向上，時代精神風氣激揚，故盛唐時期士人奮發有為。由太宗至武則天朝，薦士規模漸大，進士取人漸眾，朝廷渴求賢良，干謁徵

32. 《孟郊詩》頁 21。

33. 載《忍古樓文》，上海圖書館藏鈔本。

34. 參考余英時，〈古代知識階層的興起與發展〉、〈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載《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1-83，頁 287-400。

辟的進仕之途大開。(註 35)但開、天後治亂趨下，士族由門蔭而進者復增，寒庶的科考道路變得狹窄。在李白與杜甫等仍天真地嚮往於盛唐的人盡其才，以為眼前仍是之前那個奮發可為的世代時，他們亦覺察自己身處一個人才被摒斥的時代；是這樣的天真與覺察中的憤懣不平與現實反思造就了一代豐縟的唐詩。韓愈於中唐所致力復興的先王古道，便是針對由天寶濫觴的一股禮樂士族復古觀念，而主張依聖王之教，選賢任能，藉鞏固治權。韓愈與孟郊等詩人都是天寶以後曾屢屢被排斥於科場的人，創作上以險怪為詩；葛曉音說激烈的科場競爭造成了文人狹隘的心胸和偏激的性格，是形成奇峭詩風的重要原因。(註 36)夏敬觀所說孟郊的性行褊隘，正是指這樣的一種歷史文化心理，此乃詩人「窮」之所在。這一批文人觀風盛衰，寸心嚮往遠古聖王之道，但前途的困頓造成他們精神上的落泊空虛，感天地不容，生命無所依託，故孟郊哀歎：「古若不置名，道路無敬傾。」(〈自歎〉)讀孟郊的詩，我們會發現在在皆見「古」字，如「古劍澀亦雄」、「懷古方踟躕」、「願為古琴瑟」、「願貢高古言」、「自古推高車」、「收拾古所棄」等等，多不勝數；這大抵就是他嚮往「古道」的意識呈現，故韓愈〈孟生詩〉稱他「古貌又古心」。詩人渴慕的，是一個能實現道德理想的先王之世，〈讀張碧集〉一首云：「天寶太白歿，六義互消歇。大哉國風本，喪而王澤竭。先生今復生，斯文信難缺。下筆證興亡，陳詞備風骨……誰作探詩官，忍之不揮發。」在讚許張碧詩的同時，歌頌了陳子昂與李、杜以來的風雅興寄，流露對王澤與斯文的嚮往，其中也寓託了詩人自己的懷「古」之夢。可證孟郊的古道，實以儒家倫理為主要範圍。(註 37)又如〈噴玉布〉有句云：「古醉今忽醒，今求古仍潛。古今相共失，語默兩難恬。」追求深隱的古道，卻進退皆有礙。但孟郊雖於現實的困頓中，仍堅執其生命之道，他說：「浮俗官是貴，君子道所珍。」(〈送孟寂赴舉〉)「俗玩詎能近，道嬉方可淹。」(〈噴玉布〉)同光詩人於詩人之品格有著高水平的要求，夏氏於《唐詩說》云：「人品高者，不必有文，文高者，必其品高，始足傳世，固是不易之論」。(註 38)

35. 參考葛曉音，〈論初盛唐文人的干謁方式〉，《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頁 213-219。

36. 葛曉音，〈從詩人之詩到學者之詩——論韓詩之變的社會原因和歷史地位〉，《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 146。

37. 郝世峰在〈說孟郊〉中說孟郊的所謂古道，也融合了一些接近老子思想的應世態度。見《孟郊詩集箋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頁 3。

38. 《唐詩說》頁 45。

他深許郊詩的，在其能表現衰世中士人精神的思想深度。故唐詩人中特別選注孟郊詩，是同光體詩人藉此寄託他們對古代士人精神理想的低迴嘆息，帶著複雜的時代情緒。

夏氏對孟郊「人品」的主觀體認，具體表現於選注中除聯句外，獨不及行役與酬答兩類的詩。蓋此兩種作品中多干謁之作，會影響他為詩人所樹立的形象。又夏氏表現詩人的恪守於道，在詩注中有時甚至顯得很刻意，如〈憶江南弟〉中末句：「不然死後恥，遺死亦有終。」華氏《校注》說是詩人希望其弟能前來與他共度餘生：「遺死，意謂料理身後各事。」夏氏則曰：「所以遺我歿後者，要當思抱道以終也。」^(註 39)意在表現詩人的貫道始終。這樣的對孟郊人品的選擇性詮釋，使夏氏筆下的孟郊詩世界呈現了詩與人合一的境界；即文高者，其品必高。重視詩品與人品的關係是清代道咸以來論詩的大趨勢，此傳統詩說的回歸，意味論者於文學理想中寄託復古的政治理想，正是上述的衰世士人情懷表現。無論如何，夏氏說郊詩的「窮」，相對傳統的著眼於詩作審美感受，他是更能挖掘到創作根柢中去，指出這其實是郊詩「真」的一面。他為「至今無人能問津」(〈說孟郊〉)的孟郊詩翻案，以為東坡的詩評其實也有「愛其詩至於極處」。^(註 40)後人本東坡〈讀孟郊詩二首〉而對郊詩有毀詞，是因為不知孟郊詩：「曰褊隘、曰寒澀、曰窮僻、曰憔悴枯槁、曰局促不伸，凡持此見解者，豈足以知東野之詩耶？」(〈說孟郊〉)真正欣賞孟郊詩，要深入體認詩中的「人」，而褊隘諸語正是東野之最高性行所在，也是東野詩之最真摯處。詩人沒有在作品中虛飾自己，「不求人愛」，乃詩歌真摯之最高境。就詩歌貼近詩人真實人生的底蘊作考察，夏氏這方面的觀點沒有超出同光派主張詩品出於人品的詩論系統。用陳衍的詩學術語說，就是所謂「稱」。而正就是這樣的特點，使孟郊詩曲高和寡，知音者稀：「大凡文詞取境愈高，則知音愈罕。」(〈說孟郊〉)

四十年代，聞一多也有為孟郊詩翻案，他痛罵東坡「詆毀」孟郊詩，並肯定孟郊詩的「寫實、敢罵」，「充滿不平而又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真實世界」和「最

39. 《孟郊詩集校注》頁 320。《孟郊詩》頁 29。

40. 夏敬觀於〈說孟郊〉中指出東坡評郊詩的第一首自寫性情，與東野不合，第二首卻是愛其詩至於極處。《唐詩說》頁 84。

能結合自己生活實踐」。(註 41)也是就真率一面說去。但評價雖正面，卻沒有系統的論述。至五十年代，劉開揚評孟郊，也說是詩人「自己的實際生活的寫照」。(註 42)相對之下，夏氏用批評與選注的方式，由詩人性行的出發點作重新評價，是更能挖掘到骨節中去。

三、孟郊詩在中唐詩史上的地位

〈說孟郊〉開篇云：「孟東野詩，當貞元元和間，可謂有一無二者矣。」夏氏從兩個層次為孟郊詩於中唐詩史中定位，先自與韓詩並稱的關係入手，再建立與白詩風氣相從的關係，最終確立其有一無二的詩史地位。

作為同光體的詩論家，在尊韓的基礎上，夏氏既要突出孟郊詩，首先須將他從韓孟並稱的關係中分別出來。〈說孟郊〉云：「世稱韓孟，然退之詩與東野絕不相類，蓋皆各樹一幟。」落實孟郊詩究非韓門奇崛一路的性質。《新唐書》本傳早稱郊詩「奇澀」，宋代以來，詩家亦多以「奇」說郊詩，如魏慶之曰「奇警」、謝榛曰「奇古」、胡震亨曰「好奇」、許學夷曰「奇巧」。(註 43)夏氏指出後人認為孟郊詩過於奇異的誤解，乃由退之「劇目鉞心，鉤章棘句」之評而來。他全盤否定這一點，並就此作重新評價。〈說孟郊〉云：

東野詩無一字無來歷，卻亦無一字蹈襲古人。乍讀之，雖不免覺其晦澀難明，多讀數遍，便能咀嚼其興味，明瞭其意義，實非過於奇異者。其詩中決不使用一死名詞，決不攙雜一呆典故，其率情而書者，直是尋常言語，而高深渾厚，轉勝於一切詩家。無怪乎退之之傾服也。

意謂孟郊詩的晦澀，亦淺嘗者「乍讀」的印象而已，實則郊詩能用尋常語言表現

41. 聞一多，〈「烙印」序〉，《聞一多全集》(三)，(台北：開明書店，1948年)，頁225。鄭臨川，〈孟郊〉，《聞一多論古典文學》(重慶：重慶出版社，1984年)，頁156。

42. 杜曉勤，《20世紀隋唐五代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頁566。

43. 魏慶之，《詩人玉屑》(孟東野賈闓仙)，《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9160。謝榛，《詩家直說箋注》卷4(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頁472。胡震亨，《唐音癸籤》卷2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頁241。許學夷，《詩源辨體》卷25(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255。

詩人真摯性情，而這正是退之對郊詩的認識。韓愈為孟郊寫墓志銘，其中有句：「涵而揉之，內外完好，色夷氣清，可畏而親。及其為詩，劇目鉅心，鉤章棘句，搯擢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撇，人皆劫劫，我獨有餘。」^(註 44)夏氏說這實乃對詩人性行和詩寫得最明瞭的幾句。至於引起後人誤解的「劇目鉅心，鉤章棘句」，則退之意在推崇郊詩的獨創性。〈導言〉中有一段與〈說孟郊〉大同小異的評論：

孟郊詩，無一字無來歷，卻也無一字蹈習古人。注他的詩，不易尋著古人創造的名詞，引來作他注腳。韓愈說他作詩，「劇目鉅心，鉤章棘句。」不當作雕刻解，是說他能殼獨造。他獨造的本領，雖閒有晦澀的處所，多讀幾回，便能咀嚼他的興味，了解他的意義，實無過於奇異的。他詩中決不使用一個死名詞，決不攙雜一個呆典故，他率情而書的處所，簡直如尋常說話一樣。做這派詩，當推他是一個開山的祖師，比他稍後的白居易，正是他的私淑弟子。

夏氏對退之的詩評體認為「獨造」而非「雕刻」，與同光體詩觀有關。同光體屬宋詩派，宋詩雖講究「奇」，然如山谷所謂：「文章成就，更無斧鑿痕，乃為佳作耳。」（〈與王觀復書〉）陳衍於《石遺室詩話》論作詩之「四要三弊」，其中亦有「才思橫溢，句法超越」的要求，指才思句法若過於求工，便有弊病。^(註 45)鉤章棘句固由雕刻而來，但夏氏不欲說郊詩之「奇」，而許為「獨造」。同光詩學的「獨造」，並非只就個別作品的獨特藝術表現言，也是一種面向文學遺產的藝術自覺。於夏氏的詩史觀中，「獨造」更是決定作家是否能在文學史上佔一席位的必要條件。要避免熟，便要煉生，煉則易奇，煉而不見其奇，才是獨到。他在〈秋懷十五首〉（其五）「酸呻亦成文」句下再引退之詩評對郊詩的獨造作整體之安頓，注云：

言病骨可以截物，故酸呻亦成文章，韓愈貞曜先生墓誌所謂：「劇目鉅心，刀迎縷解，鉤章棘句，搯擢胃腎」，言其鑱刻入骨。下言「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唯其大翫於詞，而與世抹撇，人皆劫劫，我獨有餘」，則所謂

44. 韓愈，〈貞曜先生墓誌銘〉，《孟郊詩集校注》（附錄），頁 594。

45. 《石遺室詩話》卷 23，頁 6。

自然成文矣。(註 46)

郊詩由極鍊到不鍊，作品表現深刻與自然的藝術高境；夏氏所謂郊詩的獨到之處，實即《筱園詩話》所謂「涵養之純，痕迹进化」。如此，他其實並沒有否定郊詩苦吟的創作過程，只不過為強調自然成文的藝術效果，而將退之的詩評重點放在推許郊詩的「獨造」之上，以符合自己的詩史觀。夏書枚引夏氏語可說明這一點：「人謂郊詩蹇澀窮僻，琢削不暇。不知蹇澀可以醫淺，琢削可以怯俗，率爾著筆，與苦吟成章，其詩迥然不同，郊詩可貴在此，昌黎所以盛推之者亦在此。」(註 47)苦吟可以去俗，這是獨到處的由來。在同光體詩人尊韓的共同詩派心理下，退之所傾服的孟郊詩，具有不可忽視的價值。

相對夏氏對退之詩評的意義取向，華氏的體認仍就詩言詩。《校注》中〈前言〉云：「正如韓愈所稱許：『鉤章棘句，搯握胃腎。神施鬼設，間見層出。』孟郊正是運用一些險語、拗句、僻字，說出一些不經人道語，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從而展示獨特的藝術個性和奇崛生峭的美學風格。當然，由於孟郊刻意追求新奇險僻，有些詩句，鍛鍊之極，流於難以索解，顯露出刻創造作的痕迹，損害了單純自然的藝術美。反而成爲疵累，這是不足爲法的。」(註 48)華氏沿古典詩與唐詩傳統評說郊詩異相，概括爲寒苦極鍊的風格，雖有所肯定，但不無貶語。

夏氏雖有意藉尊韓詩而尊郊詩，但他以爲郊詩於唐詩風格發展上更接近白詩，而不是世人一直相提並論的韓詩。上引〈導言〉一段的末句，夏氏爲孟郊詩於中唐詩史中覓一重要席位，推之爲白詩的源頭。將郊詩與白詩並論，便在「韓、孟」與「郊、島」的風格大同中另外指出一條可以體認的路向。夏氏之前，同光派詩論家中，只有陳衍是最推崇白詩的，但陳衍論中唐詩，仍沿傳統的「韓孟」與「元白」說法。《詩學概要》云：「韓昌黎、白香山兩派，崛起中唐。白詩多近風，韓詩多近雅頌。韓、孟並稱，韓五古有雄健、幽秀二種。孟全詩只五古一體，以古樂府之骨采，寫騷雅之懷抱，警鍊殆無匹者。郊島並稱，閩仙只寫寒僻之景，非東野匹也。香山五古，有諷諭、閒適兩種。一時元白並稱。」(註 49)夏氏說郊詩開

46. 《孟郊詩》頁 15。

47. 〈夏序〉，《忍古樓詩 映龕詞合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0 年)，頁 2。

48. 《孟郊詩集校注》頁 12。

49. 陳衍，《陳衍詩論合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年)，頁 1033。

白詩風氣之先，是由「率情而書」「尋常說話」的角度出發。白詩言淺，夏氏由注郊詩的經驗中，發現郊詩也不易尋著古人創造的名詞，引來作為注腳，遂下了「無一字無來歷，卻也無一字蹈襲古人」的論斷。這正符合他論作詩的要領。他在〈為初學說作詩詞門徑〉中云：「詩詞本以能白、能言淺意深者為上。其用典故，及用字古奧者為次。白與淺亦是辭藻。但使單辭隻字，皆是雅言，而措語不俗不庸不腐不爛，其術在掃除俗庸腐爛之意及其話頭。如此作法，則根底清澈，可漸入佳境。」^(註 50)保守的同光詩人看重雅正的文詞，我們是可以理解的。站在同光後勁位置上的夏氏，為初學者說詩以能白為上，我們也易體察其用心。故儘管郊詩的淺其實有異於白詩，如夏書枚所言，郊詩的淺是由苦吟走出來。郊詩屬蒼古渾厚的樸拙之淺，而白詩則為平易近直之淺。夏氏為郊詩建構一別於韓詩而近於白詩的文學史席位，在表現其「獨造」中「自然成文」的一面。無論如何，夏氏以郊詩的「能白」為元白詩派的濫觴，頗有見地，確實能發前人所未發，可以看出夏氏的文學史觀是以他敏銳獨到的藝術感覺為基礎。郊、白並稱，明顯存在一種屬於時代的體認心理在內。近代由於白話文運動的影響，人們格外欣賞白詩的通俗性與現實性；夏氏本來就欣賞白詩的能「用常語」，和其人的品格，於是刻意將兩者的關係聯繫起來，使孟郊詩也具有相同的時代價值。^(註 51)

夏氏其實也有意藉郊、白詩的風格相從而為郊詩的「深」重新評價。宋代以來詩家不乏評郊詩「深」的，如艇齋說「精深難窺」，許彥周說「苦思深遠」，鍾惺說「深則寒」，沈德潛說「過求高深」。^(註 52)夏氏沒有否定郊詩「間有晦澀的處所」，但指出晦澀可以用「多讀」的方法淡化。讀者作為閱讀主體，在閱讀中補充審美感受，咀嚼興味，了解意義，奇異便可化為尋常，郊詩的「高深渾厚」遂可得而見之。這種體認方法屬詩味說的意義範圍，宋代以來已被詩論家講得十分透徹了。讀孟郊的詩，可以知道所謂深，是指詩中往往包含豐富的理致；而所謂多讀便能明瞭其中意義，是肯定郊詩內容有令人深思的價值。這雖不算是新的觀點，

50. 《同聲月刊》1卷11號，(署名「冬士」) 1941.10.，頁2。

51. 夏氏於《唐詩評》〈說白居易〉中亟賞劉熙載評白詩「香山用常得奇」，載《唐詩說》(台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5年)，頁99。另夏書枚引夏氏語，推崇香山人品甚高，見《忍古樓詩映盦詞合刊》〈夏序〉。

52. 曾季狸，《艇齋詩話》，《宋詩話全編》，頁2660。許顛，《許彥周詩話》，《宋詩話全編》，頁1399。鍾惺、譚元春，《唐詩歸》，《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7353。沈德潛，《唐詩別裁集》(長沙：岳麓書社，1998年)，頁95。

唐書本傳早已指出郊詩「有理致」，宋濂亦說梅堯臣的覃思精微乃由郊詩而來；^(註 53)然而在夏氏研究孟郊詩的論說體系中，言淺與意深是他標舉以體認郊詩的兩大要旨。

言淺意深，世皆以漢魏詩為第一義。《梁谿漫志》循退之「浸淫乎漢氏」之說，將東野詩放在這樣的一個高度上：「自六朝詩人以來，古淡之風衰，流為綺靡，至唐為尤甚！退之一世豪傑，而亦不能自脫於習俗。東野獨一洗眾陋，其詩高妙簡古，力追漢魏作者。」^(註 54)夏氏並不完全認同這一段話，評為「仍然是隔靴搔癢。」然後再進一步給予更高的評價：「孟郊詩的好處，不僅脫去六朝習俗，亦非以追摹漢魏為能。」（〈導言〉）這樣的觀點其實也反映了夏氏的同光體詩史觀。同光詩人追求詩歌的清新真摯外，也有一種較活絡的思維看待學古的問題，即所謂不唐不宋不漢魏不六朝，亦唐亦宋亦漢魏亦六朝。他將孟郊詩放在中唐詩史中，指出其獨特成就，及在中唐詩史中的遠承漢魏的作用。但他不以為孟郊詩追摹漢魏古詩；孟郊是寫自己的詩，詩作自有其本身的面目。

夏氏確立孟郊詩於中唐詩壇的詩史意義，而極力揄揚孟郊詩富寫實精神的聞一多，則為孟郊詩對宋詩的影響指示方向，認為是宋調之始。聞一多也從造語方面說孟郊詩，但他與華忱之的立足於唐詩的論點不同；就有奇句、用字多生僻、句法上有創格等藝術手法，揭示此乃後來成為宋詩特色的「醜中求美」的表現。^(註 55)

誠如李建崑指出，歷代評論孟郊詩的資料，就其創作苦心有給予正面肯定者，而就詩人的性格行事則往往有提出負面批評者。直到清代，論者雖大致能採務實態度，充份理解詩人生涯之寒苦，肯定其詩的託興與體製，但對郊詩之寒苦，仍不予讚許。^(註 56)由本文討論夏氏孟郊詩說可見，沿清以下，近代以來研究孟郊詩者，純粹自質樸淺易的藝術美感去全面肯定孟郊其詩其人的，只有夏敬觀一人。夏氏於近代唐詩研究中，專篇討論及選注孟郊詩，諄諄其言，拈出言淺意深的藝術特點，確立郊詩於中唐詩壇的特開一派，把它自韓門的奇崛詩風中分別出來，

53.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中國歷代文論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23。

54. 《梁谿漫志》卷七，見《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年），頁6776。

55. 聞一多〈孟郊〉。

56. 〈孟郊詩歷代評論資料述論〉頁33。

一方面是為唐詩的沿革變遷作更細密的考察，指出郊詩在詩歌發展中所起作用，由此表現他的詩史觀。另一方面，他為落實郊詩的時代意義作重新評價；由詩人中年隱嵩，抱道而終，性行褊隘，宣揚郊詩的個性化，寄託士人精神與理想。他就歷代論郊詩的窮、奇、深作重新評價，指示體認郊詩的途徑，由此表現他的詩學觀。今天唐詩研究對孟郊詩於元和新體中的開創作用有更清晰的認識，可說是沿著華氏與聞氏一路走過來的討論結果，夏氏的論說與選注雖然不能稱得上影響深遠，但在近代孟郊詩研究中實有參考價值。

聞一多說，孟郊詩自蘇軾以來，是不曾被人真誠的認為是上品好詩的。(註 57) 聞氏從貼近生活、醜中求美、宋調之始等方面肯定孟郊詩，由詩人品格與詩學風格去定位，與夏氏的體認角度有相同之處。觀察夏氏在幾種宋詩注本以外，唐詩只選郊詩一家，他應該也是由宋溯唐，看到了郊詩對宋詩的影響而作研究。此外夏氏論述郊詩或有一些屬於集體性的主題，仍有待系統性的結論；即將夏氏其餘宋詩選注都作出深究後，考察其中共同特點，才算發掘得更完整透徹。(註 58) 這也是夏氏的郊詩研究性格與華氏及聞氏不同之處，它其實是一套整體說詩系統的一個部分。無論如何，儘管今天孟郊詩的研究成果較之上世紀四十年代已豐富得多，我們仍可以看到夏氏在同光體詩學觀的基礎上說孟郊詩，有著時代與文化的鮮明記認。觀乎他稱道孟郊詩的能表現詩人性行、言淺意深、於唐詩中特開一派，對之作全盤的肯定，他是真誠的將孟郊詩推崇為上品好詩的；這種真誠，包含著夏氏自己對人格的追求，乃至對時代和人生的思考。以自己的人生觀對特別鍾愛的作家重新闡釋，可說是詩人論詩的一大特色，其見識中的亮點或許又非一般客觀的文學史研究者所能窺及。

57. 〈「烙印」序〉，《聞一多全集》(三)，頁 225。

58. 關於夏敬觀論唐詩的部分見吳淑鈿〈從夏敬觀《唐詩說》看同光體後期詩人的詩史觀〉，《文學遺產》，2004，第 3 期，頁 112-124。

引用書目

- 丁福保輯，1983，《歷代詩話續編》，北京：中華書局。
- 王 溥，《唐會要》《文淵閣四庫全書》。
- 王勛成，2001，《唐代銓選與文學》，北京：中華書局。
- 尤信雄，1984，《孟郊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 田文鏡等，《河南通志》《文淵閣四庫全書》。
-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文淵閣四庫全書》。
- 何文煥輯，1982，《歷代詩話》，北京：中華書局。
- 何紹基，1992，《何紹基詩文集》，長沙：岳麓書社。
- 沈德潛，1998，《唐詩別裁集》，長沙：岳麓書社。
- 余英時，1996，《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杜曉勤，2003，《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隋唐五代文學研究》，北京：北京出版社。
- 吳文治主編，1998，《宋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1997，《明詩話全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吳淑鈿，1996，《近代宋詩派詩論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 邱燮友、李建崑，1997，《孟郊詩集校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 屈守元、常思春編，1996，《韓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 胡震亨，1981，《唐音癸籤》，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郁賢皓，2000，《唐刺史考全編》，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
- 夏敬觀，1940，《孟郊詩》，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
- ，1975，《唐詩說》，台北：河洛出版社。
- ，《忍古樓文》，上海圖書館藏鈔本。
- ，1970，《忍古樓詩 映奩詞合刊》，台北：台灣中華書局。
- 郝世峰，2002，《孟郊詩集箋注》，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 許學夷，1998，《詩源辯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陳 衍，1999，《陳衍詩論合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1976，《石遺室詩話》，台北：商務印書館。
- 郭紹虞主編，1980，《中國歷代文論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華忱之，1995，《孟郊詩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1999，《唐孟郊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傅璇琮，1989，《唐才子傳校箋》，北京：中華書局。
- 聞一多，1948，《聞一多全集》，台北：開明書店。
- 葛曉音，1990，《漢唐文學的嬗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1998，《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歐陽修、宋祁，1975，《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
- 劉 昉，1975，《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
- 劉熙載，1993，《劉熙載集》，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鄭臨川，1984，《聞一多論古典文學》，重慶：重慶出版社。
- 謝 榛，1987，《詩家直說箋注》，濟南：齊魯書社。

韓泉欣，1995，《孟郊集校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龔自珍，1974，《龔自珍全集》，香港：中華書局。

引用論文

司金鑾，1994，〈《孟郊詩繫年補考》題記〉《淮北煤師院學報》2期。

李建崑，1997，〈孟郊詩歷代評論資料述論〉《文史學報》27期。

吳淑鈿，2004，〈從夏敬觀《唐詩說》看同光體後期詩人的詩史觀〉《文學遺產》3期。

張金亮，1985，〈孟郊去溧陽尉並非辭官考〉《鹽城師專學報》3期。

賈晉華，1993，〈華忱之《孟郊年譜》訂補〉《唐代文學研究》(四)，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An Analysis of Xia Jingguan's Study of Meng Jiao's Poems via Tong Guang Style Poetics

Suk-tin 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ABSTRACT

Xia Jingguan, a poet of the later Tong Guang style, places particular emphasis on Meng Jiao in his study of Tang poetr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Xia's views on Meng Jiao's reclusion at Mount Songshan and analyzes his re-evaluation of Meng's poems in terms of "exhaustiveness," "eccentricity," and "depth." It then goes into Xia's positioning of Meng Jiao's poems in the history of Middle Tang Poetry. Through a comparison with Xia's contemporaries such as Hua Chenzhi and Wen Yiduo,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Xia's perception of Meng Jiao's poem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his Meng Jiao study in the history of poetry in modern China.

Key words: Tong Guang style, mid-life reclusion at Mount Songshan, unfeigned character and behavior, simple expression with profound meaning

(收稿日期：2005.10.21；修正稿日期：2006.1.8；通過刊登日期：2006.5.5)